

尉天聪  
作品

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是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只是一段空白的岁月。

# 回首 我们的时代

记录台湾文坛  
一甲子的悲喜与寂寞、  
轻狂与浪漫

尉天聪  
作品

# 我们回首 的时代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我们的时代/尉天聪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34-7880-2

I. ①回… II. ①尉…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086号

---

## 回首我们的时代

财新图书主编: 徐 晓

财新图书策划: 张 缘

责任编辑: 李晓薇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75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序言

# 寂寞的时光与灵光

陈芳明

记忆总是灵光一闪，迸发出来的色泽与情调，漫漶在无法确定的泛黄时间里。那绝对是无与伦比的真切，也绝对是难以捕捉的光影；但可以感知它黏附在流动的血液，紧密与心脏一起跳动。

发生过于久远的台湾文坛旧事，即使出现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只要化成文字留存下来，必然较诸肉体还要生动，还要持久。跨过七十岁以后，尉天聪老师完成的这部《回首我们的时代》，重新描绘消失已久的风景，容许年轻世代窥见曾经浮现的盛况与萧瑟。落寞的学者，孤寂的作家，又从苍茫的历史迷雾中走出。不为人知的感情，不易察觉的思考，再次涌动。那种力道，在回首时，产生一种重量。来回行走在他的文字之间，简直是穿越一部战后台湾的人文精神史。

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之际，人文精神似乎是过时的一个名词。在举世滔滔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或许更需要注意到人的价值与气质。所谓人文，绝对不可能属于魅惑的神学，更不能属于精确的科学，而应归之于与生俱来的情感与思想。它永远充满弹性，也是一种难以定义的心灵状态。生而为人，自然会带有贪念，而且会充满私

欲。人文精神在于讲求人格的锻炼与改造，为的是更勇敢强悍地面对不断变动的世界。它不可能是僵化顽固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不同历史阶段，表达深切而温暖的关怀。尉老师的这册人物志，对台湾文坛的重要学者与作家投以深情回眸，也是战后人文精神的一个雄辩。在生命中浮现的前辈与朋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追求与社会关怀，都历历在目，完整保留在这本很精彩的散文作品。

在他温润的文字里，释放出一种慈悲，截然不同于是他年少时期的脾性。曾经批判过现代主义文学的尉老师，经过长期思考的辩证转化，慢慢培养更为从容的审美观念。当他转身回看历史的成长与成熟，似乎也变得慈眉善目。如果时光回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他还在主编《文季》的时期，可以发现他抱持着对峙与对抗，毫不留情，严厉剖析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那时他还未到达四十岁，曾经发表过一篇《幔幕掩饰不了污垢——对现代主义的考察兼评欧阳子的“秋叶”》，充分流露他强烈的批判态度。曾经站在现代诗与现代小说的对立面，他不能接受文学揭开人性的黑暗与堕落，即使到今天为止，他的评价还是有所保留。但是当他诉诸文学时，许多愤懑之气逐渐收束起来。

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后，他是重要的旗手。但是比起朋友陈映真与王拓，他出手的力道，还是相当节制。三十余年过去了，曾经飘扬的论战硝烟，完全归于平静。尉老师从未表示有任何意见的改变，不过他与现代小说家、现代诗人又重修旧好。那种情谊，无须任何文字来解释。在平日言谈中，他仍然尊重五四以降的文学传统，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精神，从未偏离他的理想。二〇〇六年出版的《枣与石榴》，恰如其分可以解释那种开放、平等、宽容的思维方式。他的文字，经过时间的淘洗，让许多杂质沉淀下来，浮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澄明清澈。没有遭遇思想上的风暴，没有经过情感上的过滤，就不可

能使狂飙的语法与句式获得升华。

对于后现代的新世代而言，他或许被视为一个保守主义的据点，或是一个怀旧思想的剩余。凡是亲近他的人，当可理解他的心灵向整个社会、整个家国敞开。若是要定位他的思想光谱，七十岁的他，应该还是相当激进。当资本主义的生活成为一种风尚，他对于权力在握者，有颇多微词。对于台湾这小小海岛，他怀有无比的信心，永远坚持民主改革的立场，不会因为早年阅读过社会主义书籍，而幻想着乌托邦式的革命。台湾渐进式的民主过程，使他看见潜藏在社会底层的文化能量不断释放出来。自私的政客耽溺于权力争夺，却无法善用民气，使台湾走向更为理想的境界。痛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决，扼腕于蓝绿斗争的内耗，他总是担心台湾社会可能失去反转的可贵机会。历史改造的契机一旦错失，极有可能使这小小海岛万劫不复。常怀忧心的他，总是感叹最好的时代迟迟不能降临。

他比任何一位知识分子，还更具有深沉的台湾感情。对岸的不断崛起，并不会使他感到恐惧。他总是密切观察，“文化大革命”何时能够获得平反。对他来说，念兹在兹，无非是从基本人权的观念出发。他总是相信，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舍弃真理。所有的理想都必须经过真正的实践，也经过落实的追求，如果只是蹈空地迷信政治信仰或立场，最后都无可避免走向悲剧。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不仅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在这时代濒临绝种的进步分子。

必须理解他的思想状态，才能够清楚看见这本作品的用心良苦。生命中的每一个时期，他从未虚掷。台湾战后史上的重要时刻，他也没有轻易放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创办《笔汇》开始，就比任何一位朋辈还更早熟地涉入现代主义运动。在那段时期，他并不只沉溺于幻想或梦境，而是诉诸实践与行动，真正勇敢去追求。台湾现代

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如纪弦、何欣、姚一苇、刘国松、陈映真，都是与他一起出发的重要作家。他们横跨现代诗、现代画、现代小说、现代批评，预告了一个更为成熟的现代就要到来。没有经过实践，他不可能当作信仰。必须看见，而且介入，他才有可能建立信心。一场文学运动的展开，形成于思想条件与历史环境未能配合的阶段，但他还是坚持走出来，甚至还造成无可抵御的风潮。

如果从辈分来看，他应该是与创办《现代文学》的白先勇、王文与属于同一世代。从起步的时间来看，他竟是提早三年出发。发展出来的路数，也与外文系出身的现代主义者截然不同。《现代文学》因为有夏济安的引导，很早就有系统地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笔汇》则是以中国文学传统为基础，慢慢建立起与西洋文学的对话。他们的老师是王梦鸥，颇具古典文学的修养，同时暗藏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书中他所怀念的前辈，如台静农、高阳、子于、俞大纲、杨逵、程兆熊、何欣、王梦鸥、姚一苇、无名氏，几乎是一个时代的重要人格。这是尉老师平生最幸运，也最幸福的时期。他们的地位与学养，代表那苍凉年代的精神象征。整个社会还未脱离萧条而残酷的阶段，却已经酿造后代无尽追索的思想指标。从年少岁月开始，他就已经与如此珍贵的人文风景相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能够与一代的最佳心灵对话，交谈，请益。那种文化洗礼，可遇而不可求。

尉老师表现出来的风范若是值得学习，应该是一个世代学术与艺术的价值，直接间接灌注到他的生命。他以如此庞大的文学，去描摹前人的智慧结晶与行事风格，似乎是在定位前辈文人的历史坐标，同时也是在定义他所接受的历史意识。回到前面所说的人文精神，那不仅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觉的生动魂魄。它并不会因为社会变迁或政治改造，就永远一去不复返。尉老师企图要证明的

是，人的学术，人的文学，从来就是可以传承，甚至可以用精致的文学追索。当他写到俞大纲的丧礼，那是由俞大维主持，拒收任何挽联。尉老师的这篇散文做了相当漂亮的结尾：“期间有人报告：‘经国先生送来了丧幛！’大维先生坐在那里，严肃地挥挥手，说：‘收起，不挂！’于是在宁静中，大纲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这是非常干净利落的回忆，也是不拖泥带水的行文。他这样写，就不足以彰显俞氏家族的情操风格。

对于朋辈，他精确掌握彼此过从的情谊。几乎传中的作家，都在他的文学里又重新回到青春岁月。他所写的唐文标、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叶笛、纪弦、梅新、大荒、商禽、楚戈，几乎构成一个世代的感觉；而这样的感觉，又构成尉老师人格的重要部分。没有这些作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判精神，恐怕会出现缺口。他们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在曲折的命运中，倒映着苍白时代的飞扬与挫折。当他写到叶笛，简直就是写到骨髓深处。其中的哭与笑，只有真性情的男人才会表露无遗。他容许我们看到一个沉默日文翻译者的内心世界，也看到一位芥川龙之介崇拜者的艺术奥秘。挺着一支灵动的笔，他写活了台湾文坛感到陌生的燃烧灵魂。这种处理友谊的方式，显然也是尉老师人格的一种延伸。有幸与他相遇，有幸与他交往，也有幸受到他这样的追念，使那些远逝的人，从此不再远逝。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一篇文章，莫过于《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琐记陈映真》。他不惮其烦，细腻地追忆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是如何诞生。在他笔下，陈映真可能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浪漫主义者。他们之间如今已是音信全无，但是长年建立起来的感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切断。写到最后一次见面，他委婉暗示，两人之间的思想取向已经背道而驰。当陈映真说：“这些年来，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

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庄严的意义的。”他刻意插入这一段话，等于是表明一条路已经走向两头。他与黄春明面面相觑，简直不知如何回应。这是思想的分歧点，也是情感的断裂点。在事件的无情冲刷之下，这篇文字还是勾起了无尽的怀念。这当然是一场令人无法忘怀的离别，也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记忆。在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谴责，更没有细微的感叹，然而一字一句，彰显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是何等亲密，何等相知，又何等疏离。读完之后，不免使人欲泪。

七十岁后的尉老师，仍然还是性情中人。他的回首，其实是不堪回首。当他转身回望，恐怕不是惊鸿一瞥，而是投以深情的凝视。二十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经历过那么多的生生死死，那么复杂的分分合合，他还是勇敢写下灵魂深处无可磨灭的身影。寂寞的时光，竟是充满奇异的灵光。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这样那样分散在各种不同的人格特质身上，他耗费心神，重新拼图思想的断片，艺术的碎片，使一个时代的风貌又再度降临。浩浩荡荡二十万字，为台湾历史筑起一块丰碑。旧时代欲逝未逝，新世代欲至未至，其中的微言大义，带来无穷的意志，以及无尽的悲怀。

## 书前的话

二〇〇七年初安民先生和季季小姐约我为《印刻文学生活志》写一专栏，并为之取名为《回首我们的时代》。这当然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因为在那之前，我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对世事即使有所认识，也一定是迹近模糊。十三岁那年，我漂泊到了台湾，没想到一转眼之间，时间已经超过了六十年。原来的世界，完全变了样子。

记得不久之前，朋友间有一场聚会，其中有些人当年曾是左派，也有人曾是右派；有人曾是统派，也有些人曾是独派，现在虽然好几位已经满头白发，头开天窗，老友相会总不免“偷闲学少年”那样唱起年轻时代时唱过的歌来，不过多少平添了嘲讽的意味而已；不只是嘲讽自己，还是嘲讽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

但这几十年的日子虽然已经不再像我们童年时代那样，几乎每天都流徙在战火动乱之间，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却经常也会不时地走过的岁月提出质问。质问什么却也不甚了了。这证明成长于我们这一环境的一代不是长于深思的人；在过往的日子里人们经常被一些动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语言鼓励着；有时激昂慷慨，有时一片沮丧。我自己和一些朋友就是一些经过这样遭遇的人。那一个时代过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大半生都是过着教书匠的生活，每碰到一些历史的问题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便也往往会在前人的智慧中寻求答案，却也经常感

到惘然。其所以如此，大部分由于面对那些人的揭示也距离我们太远。像美国籍的西班牙哲人桑塔亚纳（G. Santayana），一生中写了那么多有关生命和真理的大书，临死的时候，只对二十世纪说了一句评定的话：“绝望”。又如德国哲人洛维特（K. Lowith）身历两次世界大战，却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世纪是一个“一无所成的时代”。他们的悲愤和焦虑是那样悲壮和崇高，绝不是我们这般活在这平凡之中、苟安于世俗中的人所敢所能望其项背的。尤其在我们这样长时期处于战伐、斗争和相互迫害的国家，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够在最低条件下不虞匮乏、能够活在不恐惧的日子里做点自己可以做的事，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哪里还会有着像他们那样庄严的忧心和思考呢？

既然如此，现在轮到自己要回首我们的时代，一时之间便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犹疑之际，忽然想到，从小以来虽然教育给予我们的大都是一些“救国救民”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冠冕堂皇的“大话”，但一落到实际的生活，最后让我们为之心动的却仍然是些平常而又平凡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看来没有什么大不得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却往往会成为我们思辨的基础，帮助我们成长。譬如小学的时候老师要大家背诵《木兰辞》，同学们“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但闻女叹息”地念着，并各自编构一幅女英雄的形象，但是在后来的流亡途中，经常见到抓兵的残暴，有时连个子长得高的儿童和妇女都不放过。看多了，《木兰辞》早先给人的感受便随之变了样子。又如，少年时看戏，看到岳母在儿子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心中觉得非常气节凛然，但在自己有了儿子以后，才看到那种母爱真是人世间最大的荒唐。至于《赵氏孤儿》中的那种拿自己婴儿为主子的儿子替死效忠的作为，再怎样解说，都无法令人看得下去。而相反的，经历了大半个人生，倒觉得苦难中一声从千里外传来的安慰、口袋中

保有很多年的一封旧的家书、临终前病房中亲人的一声叮咛，却往往成为生命中最有力的支持。这样一想，便觉得：在整个人世、整个历史、整个从古到今的争争夺夺、砍砍杀杀、富贵贫贱的幻灭生死中，人与人间相互关怀的琐事。它们是那样平凡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却又与我们的一言一行紧密地缠在一起，让人无法摆脱得掉，而且，日子久了，便不知不觉地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成为生命的养分和力量。

由于有了这样的设想，我便决定在这个专栏中，与其去思考、探索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纪大事，不如借着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对那个即将逝去或逝去不久的时代，作一平实的重温。这样想着，第一个出现在我心中的人物便是台静农先生，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如庄子所说的“无可奈何”（甚或过之）的时代，却依然保持着他的自在和诚恳，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代的典范。特别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经由生活的陶熔，他的思想和写作都提升到他的同辈作家所未达到的高度。古人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在他的书艺的纯净境界中也让人看得出来。就此而言，他所显示的风格便有了时代的意义。因之，他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魏晋、晚明等大变动之际的认识，也就有了前人未及的深刻。这些即使在他平日的点点滴滴的言谈中，也会让人有所领会。

在这个专栏中，我就是循着这样的道路写下来的。我希望，经由我的追忆，让人不再把它们当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历史的重现中认出：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过；想起来让人不胜唏嘘。但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岁月。不管这世界上的事多么令人失望，令人难堪，在艰困之中，总依然有无数向上的力量还在运作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

这些文章在当初书写时，有的稍嫌简略，现在一一校订，予以增删，除了这些篇外，也把这些年在别处发表的同类作品一并收了进去，使得原来的专栏成了目前这样的样子。

在写作和整理这些作品时，我已经年过七十；回想旧事，便不是出现事件散乱、印证重复一类错误，在这方面，我的儿子任之（可可）替我帮了大忙。他担心老爸年纪大了，语言琐碎、叙事颠倒，经常在我初稿后，提出意见。有时我也执着自己的笔法，倚老卖老，两个人有时就会争吵起来。当时也许会心有不豫，到了后来却使我在再次检定中学会谨慎小心，而不至于早点走上老人痴呆的道路，因此不记上一笔，也就真的不够意思喽。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于台北木栅

# 目录

百年冰雪身犹在 · 001

苍茫独立唱挽歌 · 013

找回失去的星光 · 024

素朴坦然一君子 · 034

土地的守护者 · 045

依旧是鹅湖风采 · 054

孤寂的旅程 · 068

他影响了那么多人 · 080

怀想那一段岁月 · 093

无名氏最后的日子 · 102

燃烧的灵魂 · 112

悲悯的笑纹 · 125

寂寞的打锣人 · 134

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 · 148

府城的李白 · 179

独步的狼 · 189

诗人与同温层 · 202

掉进猪笼草的飞虫 · 208

那个时代，那样的生活，那些人 · 217

苦行的旅者 · 232

江湖寥落那汉子 · 243

去奚淞家看画 · 260

怆然的回望 · 273

# 百年冰雪身犹在

## 记台静农先生

那是一个难以自处的时代。到现在似乎依然如此。在某些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的操作下，人与人的种种关系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活的负担：稍一不慎就会因某种牵连而遭到严酷的伤害和纠缠。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来台的前辈作家和学者中，台静农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由于他是鲁迅的弟子，是鲁迅领导的“未名社”和“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陈独秀有着深厚的友谊，在现实政治的斗争中，他便一直遭到不同方面的层层困扰；但也因为如此而显现出他独特的气度和风格。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从一些粗浅的新文学知识里认识了台静农先生，知道他出版过《地之子》和《建塔者》两本小说集。但并没有真正读过。一九五八年，也就是我就读大三那年，我接办了《笔汇》杂志，经由何欣先生和我在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王梦鸥先生而认识了老一辈的作家台静农和黎烈文先生。台老是我五姑的老师，又是何欣先生的前辈，不久也就有了交往。从此以后，我便随着大家恭敬地称之为“台老师”，而私下里则尊称之为“台老”。但何欣先生说：“可惜我们不能向他们约稿，处在这样的日子，他们写什

么恐怕都不方便。”

那时候，王老师的一些朋友，不时会有小聚，王老师常带我参加，多次以后，也就成了他们熟识的晚辈。这小聚经常参加的有台静农先生、屈万里先生、庄严先生、夏德仪先生、孔德成先生。地点都是在台北的会宾楼饭馆。这馆子是山东人开的，宴会如有孔德成先生参加，老板闻声必亲自到大门口迎接。虽然他的年龄比孔先生大好几岁，却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孔先生，而且酒筵时奉送一两道特制的小菜，安排一位小姐随桌伺候。大家都直呼孔先生为“圣人”，想些点子对之戏谑。孔先生温厚诚朴，风趣又幽默，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圣人”的气象。

台老则被大家尊为酒仙，但他并不飘飘然。他的仙是稳重的，自然而亲切，而且充满了洒脱，就像他烟斗里飘出的烟，给人一种高雅的自在。然而在他与朋友们相互嘲谑时，却让人感受到一种上一代人所具有的温馨。有一次，庄老喝多了，散席时我要送他去车站搭车，台老说：“不用，不用，天聪你千万不要杀老庄的风景，让他自由自在地去逛花街柳巷吧！”起先我真以为庄老有夜游之癖，庄老走远后他才对我说：“你不知道，老庄这个人的拘谨是有名的，我们这些老朋友互相取闹，他还可以应付自如，一碰到你们晚辈，他就会紧张得不知所措了。所以他很少接受邀请去大学里教书，偶然一两次被拉上台去讲话，也都像绑赴刑场那样浑身不自在。”

台老表面这样洒脱，某些时候内心里其实也有他悲凄的一面。他的老友中，来台后最早过世的是黎烈文先生，因为中风，受尽折磨而死。黎先生为了过重的家庭负担，一直过着译稿和兼课的忙碌生活，中风后经常要接受教会的救助。他过世后，丧礼之凄凉，真是让人落泪。我为抗议这种社会的无情，写过一篇《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在一家报上发表。在黎先生的灵堂上，台老紧绷着脸，一